



“读懂广州”系列文物展

百件文物讀廣州

Get to Know Canton
Exhibition of 100 Cultural Relics about the City

09 · 27 2022
—
02 · 05 2023





前　　言

在两千多年的建城历史长河中，广州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民主革命策源地、改革开放前沿地，留下了丰富的历史人文积淀，是广州厚重的文化财富。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强市的建设，是广州延续城市文脉、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作为城市博物馆，广州博物馆肩负着讲述、传播城市历史文化的职责和使命。为此，我们精选馆藏百件代表性文物举办“读懂广州”首展，提纲挈领地向公众展现岭南文化、海丝文化、创新文化、红色文化要点，感悟历史启迪未来，一起读懂广州，热爱广州，奉献广州。

Preface

The city of Guangzhou has a history of over 2000 years. It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center of *Lingnan* Culture, the originating port of the Maritime Silk Route, the cradle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the forefront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ll of which endow the city with rich culture and human heritage. We believe that our country will thrive only if our culture thrives, and our nation will be strong only if our culture is strong. Constructing a city with profound culture provides fundamental support to better retain the city's culture root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s a city museum, the Guangzhou Museum is always well aware of its mission and commitment to tell and pass on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city to the public. In this exhibition, about 100 sets of artifacts are meticulously selected from the museum's collection to throw light on the different features of *Lingnan* culture, as well as the city'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Maritime Silk Route, innovation, and revolution. We hope that a stroll among the exhibits acquaints the viewer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ity, and their passion to love and esteem the city can thus be inspired.

第一部分 多元融合的岭南文化

Lingnan Culture: Diversity and Integration

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一脉。广州，是岭南文化的中心。

秦平岭南，赵佗和辑百越，揭开了开发岭南、汉越融合的序幕；三国两晋南北朝，中原人民大量南迁，广州经济和文化进一步发展；隋唐宋元，商贾往来频繁，文化交流兴盛；明清时期，广府文教兴盛，文人蔚起，“度越中原”，影响全国。广州建城 2200 多年间，岭南文化逐步形成，生机勃勃，充满活力。

Lingnan culture shares the common cultural wealth of China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ation's culture, while Guangzhou serves as the hub of *Lingnan*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ngnan* area and the fusion of Han and Yue peoples embarked when the first Emperor of the Qin Dynasty conquered the *Lingnan* area, and Zhao Tuo promoted the policy of “Amalgamating the hundred Yue tribes”. From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onward, the economy and culture in Guangzhou further developed along with people migrated to the South from the Central China. Exchanges of commodities and cultures kept thriv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Sui, Tang, Song and Yan Dynasties, whil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itnessed the heyday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when renowned scholars emerged and imposed a national-wide influence. Over the past 2200 years, *Lingnan* culture gradually took shape and developed its own features, and magnificently imbued itself with vitality and charm at the same time.

秦代
『十四年属邦』铭文铜戈

内端一面刻有“十四年属邦工□戩丞
□□□”十二字，十四年为秦始皇十四年（公元前233）。这把铜戈是南下秦军的武器，是秦平南越的重要历史物证。



木胎黑漆，盖面朱绘云纹，烙印“蕃禺”二字。史载，“蕃禺”即番禺，是秦置南海郡的首县，又是郡治所在。这是岭南地区“蕃禺”这一地名见于考古实物的最早一例。

秦代
『蕃禺』漆盒盖



西汉
1953年三元里梓元岗出土

越式「食官第一」陶鼎

南越国(公元前204年－公元前111年)是岭南地区第一个地方政权，南越国遗址和墓葬出土的众多文物都带有汉文化内涵的铭文，反映南越国仿照汉王朝制度而立，同时又出现许多越式陪葬器皿，是汉越文化交融的例证。



晋代
1954年西村孖岗出土

『永嘉』铭文砖

砖上刻有铭文“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西晋永嘉年间(307-311)，北方战乱，广州不受战争影响，社会相对平稳，汉人大规模南迁，带来中原先进的生产工艺，经济繁荣发展。三国东吴黄武五年(226)，交州被划为交、广二州分治，“广州”因此得名，并一直沿用至今。

蛙形金饰片

南北朝 1955年小北出土

凤鸟蛙形金饰片

南北朝 1958年三元里出土

凤鸟形金饰片流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吴越地区，近年多地考古陆续发现，广州地区较多出土蛙纹或凤鸟与蛙纹相结合的金饰片。岭南地区自古崇拜蛙，器物上多饰有蛙纹，这类型金饰片反映了此时期北方移民对岭南地区的影响。



蛙形金饰片



凤鸟蛙形金饰片

六面铜印

南朝 1955年华南工学院出土

台钮顶面刻“白记”二字，印正面刻“周承公”三字，四个侧面分别刻“周君时”“周承公白事”“周承公白牋”“臣承公”。

“白记”是下级对上级陈述意见的奏记；“白牋”用在叙事的书信中；“白事”印于姓名后面，专用于书简往来。晋南朝流行六面印，属私印性质。



白记



周君时



周承公



周承公白事



周承公白牋



臣承公

『部曲将印』铜印

晋代 1953年广州龙生岗出土

“部曲”系汉代官职，“部曲将”设置于东汉末年，魏晋时期沿用之，统领部曲的将领称为“部曲将”。魏晋南北朝时期部曲制迅速发展，因社会动荡，部曲逐渐成为世家豪族的私人军队，并为主人从事农耕生产劳动。该印反映此时广州跟北方一样以部曲制为地方性军事和生产制度。



端溪箕形砚

唐代 1953年广州动物园唐墓出土

该砚由端溪朝天砚石所制，石质细腻，呈紫蓝色，砚面后宽前窄，呈箕形，砚池底部凸出着地，形似足根；砚底后部有两个梯形方足，与砚池底部成三足鼎立状。造型古朴，简练流畅，属唐代端砚精品。端砚自唐代闻名海内，为传统文房四宝中的珍品，但唐代端砚流传甚少，该箕形砚为现存出土时间最早最完整的唐代端砚，为研究岭南地区用砚历史提供实物证据。



青釉辟雍瓷砚
唐代 1955年小北横枝岗出土

辟雍砚的主要特点是砚池围绕砚堂周边，如辟雍环水。辟雍砚始于东汉后期，发展于唐代。因唐朝皇帝极力倡导书法艺术，研习书法之风浓厚，砚台的需求量很大。随着瓷器制造业飞跃发展，瓷砚也随之盛行。



『芳华苑』铁花盆
南汉

此花盆为南汉大有四年（931）铸造，盆体两面铸铭文“大有四年冬十一月甲申朔造”“供奉芳华苑永用”。芳华苑为南汉皇帝刘岩的离宫，在今广州城西荔枝湾一带，是南汉帝王游宴的花园。

南汉是岭南地区历史上第二个地方政权，以广州为国都，改称兴王府，此时广州城建进入大发展时期，进一步提升了广州在岭南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重要性。





宋代
1973年越华路出土
水军修城砖

宋代是广州城建史上修城最频繁且规模最大的时期，据统计，两宋期间大小修城有 20 多次。宋初，广州子城的城墙还是版筑的土城，熙宁元年（1068）始改为砖城。熙宁四年（1071），经略使程师孟调集水军、厢军等大批军士，耗时一年修筑西城。从此，广州有了“三城”之称。南宋方信孺咏广州三城：“三城不断郁相望，千里长江势渺茫。蛮獠传闻亦胆破，从知岭外有金汤”。

陈璞纸本『观音山』图横轴

清代

陈璞，字子瑜，号古樵，番禺（今广州）赤冈人，道光二十四年举人，粤人以黎简、谢兰生、陈璞推为“画家三杰”。

屈大均《广东新语》称“粤秀为广州主山……岡在粤秀肘腋之间，灵异所结，乃广东人文所恃赖者”。观音山是越秀山的主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越秀山被纳入广州城范围内，广东官员在山麓陆续兴建私家园林、书院学堂、军事设施等，该区域成为广州城军事要点、文化中心。



『寒涛』琴

明代

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别号石斋，广东新会白沙里人，又称白沙先生，明代哲学家、教育家，是广东唯一一位从祀孔庙的大儒，是明代心学的奠基者。“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从陈献章倡导涵养心性、静养“端倪”之说开始，明代儒学由理学转变为心学，这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陈献章以“学贵自得”“学贵知疑”为核心，开创了岭南第一个成熟的学术派别——“江门学派”。陈献章平生清雅好琴，常携琴游走四方或与好友抚琴唱和，此琴传为陈献章收藏和弹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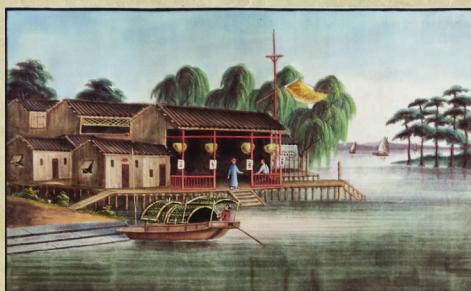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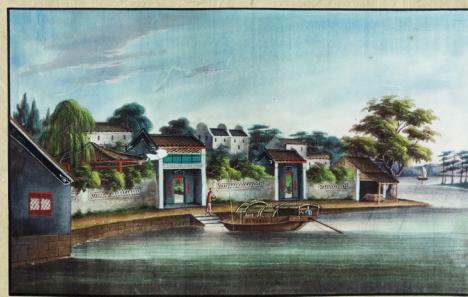
清代贝雕广州『百子桥』人物故事图摆件

摆件用完整贝壳雕刻而成，形如簸箕，外壁素身无纹，内壁剔地浅浮雕广州城东“百子桥”河道景观，饰蓬船、撑船人、上帝古庙等图案。《广州城坊志》记述：“百子桥，在东门外育婴堂侧，原名百花桥，又名状元桥。建育婴堂时，改名百子桥。”雕刻的建筑类似镬耳屋，为岭南地区传统建筑样式，展现清代广州水道及河岸美景，极富岭南文化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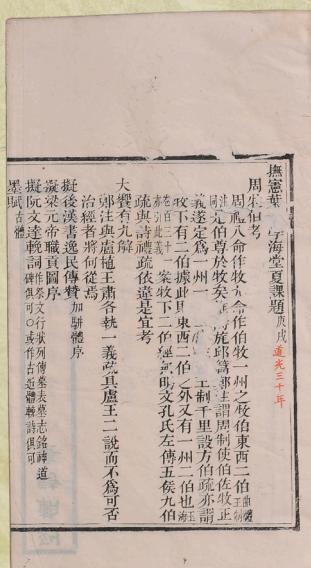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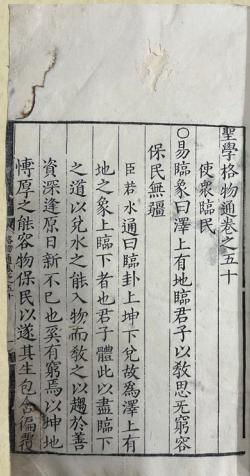
图中建筑类似镬耳屋，为岭南地区传统建筑样式，建筑依水而建，岸边有石级，蓬船是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蜿蜒的水道及河岸美景生动展现了岭南水乡居民与山水相依的生活方式。





湛若水（1466—1560），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广州府增城县甘泉都（今广州市增城区新塘）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大儒。

湛若水在继承陈献章学说的基础上，提出“格物为体认天理”与“为学先须认仁，仁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理念，创立了“甘泉学派”，与王阳明的“阳明学”被时人并称为“王湛之学”。他创办书院近40所，门徒多达4000余人，缩小了岭南学术与素来发达的江浙学术之间的差距，有力地推动了岭南文化发展。



清代
学海堂课题

清道光四年（1824），两广总督阮元为课全省举、贡、生、监经解诗赋，于粤秀山创办学海堂，延聘吴兰修、赵均、曾钊、徐荣等八位学者为学长负责教学以及校务工作。学制三年，不课八股，专课经史诗文，外兼小学（文字学）、天文、地理、算法等课程，从事切实学问的研究。著名学者陈澧、桂文灿、梁启超等都出自学海堂，学海堂是当时广东学术的重要阵地。

屈大均著《翁山文外》

吴兴刘氏嘉业堂刊 庚申年（1920）

屈大均（1630—1696），号非池，字骚余，又字翁山、介子，号菜圃，广东番禺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诗人，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其多才多艺，善画兰竹、山水，书法各体皆精，尤擅行草，墨迹传世不多。晚年致力于收集和编纂广东文献、方物、掌故，著有《广东文集》《广东文选》《广东新语》等。



广雅书院课卷

清代

光绪十三年（1887），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广雅书院。广雅之名，取“广者大也”“雅者正也”之意，即要培养学识渊博，品行雅正的人才。首任学长为梁鼎芬，后任有朱一新、廖廷相、邓蓉镜、谭莹、丁仁长等广东著名学者。课程分为经学、史学、理学、文学4门，学生可自由选择，兼习文章之学，原定学制3年，后改为9年。

广雅书院创建后即破除旧科举制度，设务实课程，办学宗旨“砥砺名节，关心时务，吸收新知，并使他们能出仕则为国家栋梁，为民则成为社会中坚”，是当时全国著名书院之一。

陈澧绢本行书团扇面

清代

陈澧（1810—1882），字兰甫、兰浦，自号江南倦客，因其著作《东塾读书记》被尊称为“东塾先生”。广州府番禺县（今广州）人。被称为“东南大儒”“南交第一儒林”，享誉海内。陈澧创立的东塾学派是清代广东学术文化的标志之一，东塾弟子有名可考者102人，其中隶属广府籍者占绝大多数，张之洞曾称“庶几从此东塾学派流衍中原”。



苏六朋药洲品石图卷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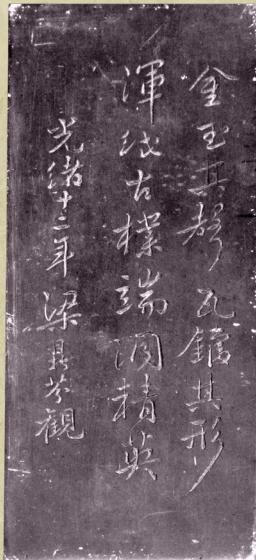
清代

药洲遗址位于今广州市教育路，原为南汉时修建的皇家园林。当时广州西湖路附近一片泽国洼地，南汉高祖定都广州后，凿湖五百余丈，建成园第池沼，置三江奇石为洲屿，据说最初奇石有九，故名九曜石，又遍种芍药点缀，因此得名药洲。宋代以来，药洲为广州城内名胜之首，列入羊城八景。明代嘉靖元年（1522），广东提学道署已入驻此处，称为“南国传经地”，清代继续成为广东提督学政署的所在地，是清代主管全省文教的地方官署，简称学政、学院、使院、试院、学署或学召，对广东文教发展至关重要。



清代

硯台一侧由该硯主人陆应暄题“井尔井，田尔田，宜丰年。素心兰室珍藏”，另一侧由梁鼎芬题“金玉其声，瓦铛其形。浑纯古朴，端洞精英。光緒十二年梁鼎芬观”。陆应暄是晚清广州府番禺县人，字石孙，号素心兰，著有《素心兰室诗钞》。梁鼎芬（1859—1919），字星海、心海、伯烈，晚清文学家、藏书家、诗人，广州府番禺县人，清光緒三年（1877）入菊坡精舍，同学陈澧，先后任丰湖书院院长、端溪书院院长、广雅书院首任院长、岳州书院院长、钟山书院院长，两湖书院院长等职，与罗惇曧等人并称“岭南近代四家”。



陈恭尹撰《镇海楼赋》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仲春，“岭南三大家”之一陈恭尹与友人相约登越秀山镇海楼，极目远眺，层楼怀古，作此赋并自书。此作品传承有绪，兼有历代题跋，被誉为“粤中巨迹”。明洪武十三年（1380），永嘉侯朱亮祖将宋代三城合一，在越秀山最高处修建望海楼（后称镇海楼），楼借山势，威震南疆。“镇海层楼”“越秀层楼”被列入清代和现代羊城八景。六百多年间，镇海楼曾作为明清广州老城标，见证这座城市的发展变迁，2019年又成功入选中华历史文化名楼，继续传承岭南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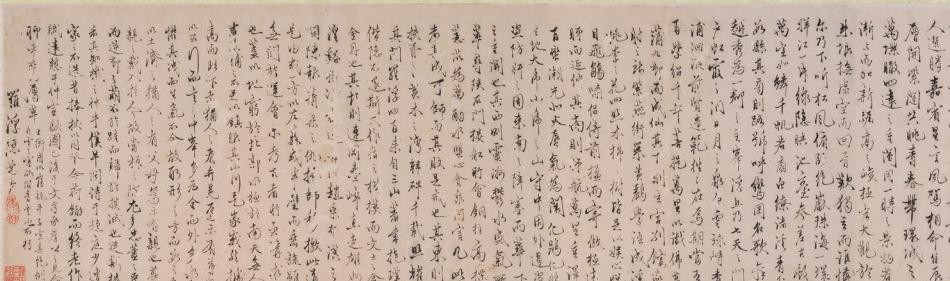
獨流先生詩文原本忠孝出
性情忠古傳今時聞嗟惜晚
年政廢主角如干將在風
而龍鳴此賦辭未甚平敷
陳其事而已吳政張詩出人
論立其說詳盡珠上在前少
更弄斧儼然矣癸未早春
唐翁仁兄屬題 陳繼



陈恭尹先生像



镇海楼图



右林樹源先生集海樓集卷之三在於歐州

鍾古而嚴，其清瘦猶存，越狀或證極精

審今歸故，

宿萍湖心亭賦題漫賦七絕三首

追憶當年多苦心，登臨詞賦類沈吟。

愧士尚甘飴海日，是躬唐真有奇。

舉日洞風景殊勝，搖旗無點半興亡。

七十載嘗如夢，厭桃紅似火大。

稚竹於小萬山道，索流集葉刻文字。

因緣應有屬焉新風雨，伴儂閒。

歲次癸卯月覺透人間，猶尚逃世遠。

舉書在玉者，立齋。

丁巳夏

第二部分

开放互鉴的海丝文化

Coastal Culture: Openness and Mutual Learning

东方港市，千年商都。舶影文光，交流互鉴。

广州南面大海，北通内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始终是海上丝绸之路东端的重要节点，被誉为“两千年永不关闭的门户”。海路贸易为广州留下了诸多历史遗存，追溯这些遗迹遗物与史事，可以感知先民们在推动海上文明交流中所付出的热忱和贡献，以

清代
广雅书院课卷

光绪十三年（1887），两广总督¹取“广者大也”“雅者正也”之意，²首任学长为梁鼎芬，后任有朱一新等广东著名学者。课程分为经学、
由选择，兼习文章之学，原定学制

广雅书院创建后即破除旧科

陶船
(复制品)

东汉 1954年沙河项汉墓出土

这是一艘内河或沿海航行的客货两用船。船分前中后三舱，船尾有望楼，船前系锚，后有舵。“舵”的发明是中国古代人民对世界造船史的一大贡献。此陶船证实了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提出的伟大推想：中国在公元三世纪或更早时期就发明了船尾舵，比欧洲早了近一千年，此结论随后被其写入《中国科学技术史》。



总督张之洞创办广雅书院。广雅之名，即要培养学识渊博，品行雅正的人才。新、廖廷相、邓蓉镜、谭莹、丁仁长、史学、理学、文学4门，学生可自到3年，后改为9年。

举制度 设备实课程 办学宗旨“研



铜熏炉

西汉前期

1956年黄花岗出土

炉体方形，盖面及腹部镂空成“回”字体图案的气孔，方柄圆座足，出土时炉内残留炭粒状香料。熏炉是一种专用于燃熏香料的室内生活用品，广州汉墓普遍有熏炉随葬，出土时炉腹内常有灰烬或炭粒状香料残存，一方面反映薰香已成为汉代贵族生活的一种风尚，同时也说明因海外贸易兴盛，从海外输入大量燃薰香料。



蓝色玻璃碗

西汉中期

1954年登峰路横枝岗出土

同一墓葬共出3件，深蓝色半透明，广口，圆腹，平底。唇下有凹形宽弦纹。器内壁光滑，外壁经打磨，有朱砂痕迹。经科学检测，该碗为钙钠成分玻璃，与古代中国生产的铅钡成分玻璃不一样，推测其产自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帝国，为舶来品。



水晶玛瑙珠串

东汉前期 1955年龙生岗东汉夫妻合葬墓出土

该墓是广州汉墓出土珠饰品种和数量最多的一座，女棺内有十二面菱形镂空金球、金珠、银珠、玉、白色紫色水晶、淡黄色玛瑙狮及用药物蚀花的玛瑙珠共116颗，同墓还出土1965颗琉璃珠。两汉墓葬出土大量珠饰，表明这是汉代广州先民日常生活佩带的饰物，应为当时海路贸易的输入品。



木雕罗汉坐像

唐代

该罗汉像于1950年在光孝寺大佛肚子内发现，既是极其珍贵的唐代广州佛教文化遗存，也代表这一时期高超的木雕技艺。

胡人俑

唐代 1990年白云山农场双燕岗管理区长腰岭唐墓出土

唐宋时期随着海路贸易的兴盛，每年都有许多外国商船抵达广州进行贸易，有不少外国人在贸易季节过后仍居留在广州经商，其中以波斯、大食等国的阿拉伯商人为主。这对胡人俑展现了当时来华的外国人形象。



白釉军持

唐代



军持是一种瓶装盛水器，又名军墀、君迟、群持、据稚迦、净瓶等，隋唐时期传入我国。佛教徒及伊斯兰教徒均有使用军持，器型稍有不同，佛教徒多称之为净瓶，为礼佛时净器；伊斯兰教徒用于净手。唐宋时巩县窑、定窑等白瓷窑场所产军持最受欢迎，元代德化窑、磁灶窑、西村窑均有出口，明代以景德镇窑产品为主。

青釉刻花卉纹凤首执壶

宋代
香港徐展堂先生捐赠

北宋西村窑位于今广州市西村皇帝岗，为北宋时期广州外销瓷生产基地，其产品在西沙群岛、东南亚及日本、斯里兰卡等地均有发现，见证了当时广州与南海诸国的贸易往来。凤首壶是古代阿拉伯地区流行的器型，唐代开始烧制，大多出口至波斯、大食等西亚地区。



威尼斯银币

明代 1984年东山姚家岗明代市舶太监韦眷墓出土



正面



反面



『乾亨重宝』铅钱

南汉

南汉高祖所铸，是当时流通量最大、流通时间最长的货币。在印尼海域出水的印坦沉船也有发现，证明了南汉时期海外贸易的兴盛。

明代
浮雕荷叶形犀角杯

明清时期，象牙、犀角、水晶、珊瑚、琥珀、酸枝木、硬木等贵重物料源源不断地从海路输入广州，并由工匠加工制成精致的工艺品。此杯用进口犀角雕刻而成，是古代最珍贵的盛酒器，兼具药用和艺术欣赏价值。犀角有清热解毒、定惊止血的功用，工匠把犀角做成酒杯，希望犀角的药性溶于酒中，在饮酒的同时达到治病强身的目的。



黄埔锚地
约1845年
象牙油画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设粤海关，加强对进出广州口岸的外国商船管理，凡前来广州的外国商船，必先泊于澳门，向海防衙门办理申报手续获批后方可驶入虎门，到黄埔锚地停泊，再用舢舨船将货物运至十三行商馆区贸易。画面中各国帆樯云集，各种接驳小艇往来穿梭，再现了广州黄埔港昔日的繁华。正中央的小岛为黄埔挂号口所在，设有税馆负责丈量船只，清查收税。



广彩描金徽章开光风景纹汤盘

清乾隆

盘中央为马德拉斯港市风景图，边沿两侧分别对应绘制中国广州黄埔港和英国普利茅斯港景物。盘口沿上下绘有拉德伯恩的波尔家族纹章，为利物浦国会议员查尔斯·波尔而制。

普利茅斯（Plymouth）位于英格兰德文郡，曾是英国皇家海军的造船厂，也是16—19世纪英国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马德拉斯港（Madras）位于南印度东岸，163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附近建立贸易站，至1652年，马德拉斯已成为英国在南印度的棉纺织品和手工艺品基地。黄埔港是18、19世纪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停泊缴纳货税的地方，也是中西贸易的重要港口。三个港口在中英贸易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此盘设计巧妙，是18世纪中英贸易历史的重要见证物。



售茶图
十九世纪
通草水彩画



画中室内二人正在交谈，室外工人将茶叶装箱。两旁分别绘有拣选茶叶、筛茶以及炒茶场景。茶叶、丝绸、瓷器是18世纪以来中西贸易的大宗商品，这三者也是吸引西方人开启东方冒险之旅的最原始动力。以三类商品为主题的通草画，大多成套绘制其生产贸易过程，成为当时西方社会最感兴趣的商业指南。广州得益于18、19世纪特殊的贸易地位，成为三大商品的输出港，外销画上大量出现此类题材，从侧面反映了清代广州贸易的兴盛。

『哥德堡号』沉船打捞出水的茶叶
清乾隆 中山大学蔡鸿生教授提供

清代广州是中国最大的茶叶市场，粤海关每年征收的茶税约四十万两。“一口通商”时期，广州作为对外贸易的唯一商港，各地的茶叶从内河运至广州，再装箱出洋。1840年之前每年约有45万担茶叶从广州输往世界各国。这是从瑞典“哥德堡号”沉船打捞出水的经广州出口的福建白毫茶，至今色味尚存。



清乾隆
2006年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访问广州时赠送广州市市长
瑞典『哥德堡号』沉船打捞出水青花斗鸡纹盘

“哥德堡”号是一艘以瑞典东印度公司总部所在城市哥德堡命名的重要船只。1739—1745年间该船曾三次远航广州，其中第三次航行装载了包括100吨瓷器在内的700吨中国货物回国，1745年9月12日在距哥德堡口岸约900米远的海域触礁沉没。“哥德堡”号装载的100吨瓷器中有四分之三是青花瓷，足见瑞典人对中国青花瓷的钟爱。



清代
贴象牙人脸彩绘广州风景人物纹故事图折扇

一面绘有双桃形开光广州风景图，河道蜿蜒，小船扬帆，两岸群山叠翠，宝塔民居行人隐现其中，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间隔处绘有芭蕉形开光庭院人物图。另一面绘清装人物宴席图，共计50人，为今人留下了珍贵的清代岭南水乡人文风貌及生活情景。



第三部分

奋进开拓的创新文化

Innovative Culture: Endeavor and Exploration

海纳百川，继承发展。勇立潮头，创新求变。

该部分以清代广州工艺为例，重点展现广作匠人如何继承传统、融会中西，创百艺新风，不断生产出兼具广州特色和技艺领先的广作精品。它们既是这一时期中国工艺美术的代表作，也承载着精益求精、超越自我的创新精神。

Works of art dating to the Qing Dynasty are specially selected and showcased here to tell the story of local craftsmen, who keep honing their skills and create Canton-style products of fine and delicate craftsmanship by inheriting traditional techniques, incorporating Chinese features with those of the West and successfully creating new trends. These *objets d'art*, so enamored Europeans at that time, are celebrated a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ese works, which testify the spirits of innovation of Cantonese craftsmen and their unyielding commitment to be the very best.

红色团龙纹暗花绸氅衣
晚清

氅衣面料为传统团龙纹暗花绸，提花清晰，织造精致。通身一道白地几何纹绦，饰白底绣蓝色花蝶图边，花蝶图应采用了广绣反咬针法，由内而外做一批压一线，使盖绣上面的绒线略微隆起，颜色匀净，在质感、绒线的反光方面加强了艺术效果，是广绣中的精品。



红色花蝶纹广缎
清代

红地缎，用白、绿、蓝、黄等色织成花蝶，构图严谨繁密，色彩艳丽，为清代广东官员进贡的贡品，代表了清代广缎的最高水平。1960年代故宫博物院调拨广州博物馆收藏。此缎充分体现广缎的地域特色，其图案、花型设计零碎偏小，但花纹的轮廓和线条自然工整，繁而不乱；同时采用反差强烈的色彩，显得十分炫耀夺目，渲染出欢乐和热烈的气氛，具有浓郁的岭南装饰风格。



广绣大披肩是清代中国外销丝绸中的重要种类，在西方被称为“中国披肩”，因其由广州运往菲律宾马尼拉再转运欧洲销售，又被称为“马尼拉披肩”。“马尼拉披肩”在继承传统广绣技法的基础上，创新生产出不同时代各具特色的产品，其面料、染料的变化（特别是鲜艳化学染料的出现），以及规格、配色、构图、题材、风格的演变等，既反映了中西文化相互影响和交融的过程，又是当时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鲜活载体。

早期出口的披肩为长方形，1830 年代末开始出现方形披肩。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流苏和编结持续加长，到了 20 世纪初，流苏长度可达 40 厘米。早期和中期刺绣的留白比较多，后来受海外市场审美影响，纹样中的花卉尺寸变大，布局越来越满，早期风行的四角布局已不明显。到了 19、20 世纪之交，白地或黑地的绣花都很流行，1856 年英国人发明的淡紫色化学苯胺染料出现之后，紫红色也成为流行色。



银鎏金累丝花朵形挂饰

十九世纪

造型优美、轻巧别致，疑为西方女士服装配饰。累丝工艺又称“细丝工艺”“花丝工艺”，是将金或银加工成丝，再经盘曲、掐花、填丝、堆垒等手法制作金银饰品的一种精细工艺。



银錾刻纹章菊花纹茶具

清代

此茶具一套五件，含茶壶、咖啡壶、糖碗、奶罐（饮用时通常搭配瓷质茶杯）和托盘，各器腹部留出盾形纹章图案，盾牌内刻定购者的姓名缩写字母。中国外销银制茶具，初期主要为传统中国式样，随后出现按西方审美和习惯定制的外销器型，欧洲社会当时流行的装饰风格如洛可可、新古典主义等也随市场需求变化陆续出现在中国外销产品中。



象牙镂雕蝠寿宝相花套球

清代

广州地区的象牙雕刻工艺历史悠久，西汉南越文王墓出土的象牙卮证明汉代广州已有牙雕工艺。随着明清时期海外贸易的兴盛，各种贵重原材料大量进口，广州牙雕工艺迅速发展，形成别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广州牙雕以牙球、牙扇、牙舫最具代表，其中象牙球又被称为“鬼工球”，因其“鬼斧神工”般的技法令世人惊奇。工匠将一整块象牙用镂空工艺雕成，至今最高可达 50 多层，球内层层相套，转动自如，玲珑剔透，图像交错隐现，奇巧异常。



玳瑁雕庭院人物纹名片盒

清代

盒身正反两面剔地深雕亭台楼阁、人物、树木花卉等纹饰，构图繁满，雕工精细。名片盒是西方社交场合的产物。清代，随着中西贸易交流，名片盒是西方社会定制的高端商品，传入中国后成为文人雅士的时尚品，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象牙劈丝花卉徽章纹折扇

清乾隆

此扇由象牙制作而成。两侧扇骨剔地浅浮雕菊花枝叶纹，运用镂空劈丝工艺制成，雕刻细腻，象牙劈丝细如毛发，堪称广州牙雕工艺的巅峰之作。扇面分上中下三层装饰，上层顶端呈半圆形，镂空团花纹；中层为劈丝及浮雕缠枝花鸟蝴蝶纹饰，正中有一盾形开光，内雕折枝花卉及定购者的英文姓名缩写字母。此类折扇属清代对外贸易中常见的私人定制产品，可根据不同订购者的需求在扇面中部的通用盾形开光纹章图案内添加个人姓名缩写字母，体现了广州工匠为适应外国市场的个性化需求、缩短产品定制周期而采取的灵活生产方式。





玳瑁劈丝开光山水花卉徽章纹折扇
清乾隆

此扇由玳瑁制作而成。两侧扇骨剔地浅浮雕花卉纹，扇面单面雕工，整扇劈丝成地，再结合浅浮雕技法，分上中下三层装饰。上层顶端呈半圆形，雕花叶纹。中层上部分别雕有圆形缠枝纹、菱格花卉纹两行装饰，正中有一椭圆形开光，内雕定购者姓名缩写的英文花体字母，两旁各有一圆形开光，内雕宝塔庭院纹饰。下层雕缠枝花卉纹。

扇骨选用不同材质的物料雕刻不同题材的图案。两侧大骨为铜鎏金柳亭人物纹，其余小骨分别为茜红象牙雕人物花卉纹、贝雕人物纹、银鎏金累丝烧蓝宝相花纹、象牙雕庭院人物纹、玳瑁雕庭院人物纹、檀香木雕庭院人物纹。扇面彩绘三个开光，正中为广州风景图，描绘河道蜿蜒，一艘广船大眼鸡正扬帆，两岸群山叠翠，宝塔民居行人隐现其中；另外两个开光绘庭院人物图，四周描银绘花篮绶带、乐器、花卉等吉祥纹饰；另一面绘宴席图，共计 50 人，人物面孔用象牙制作粘贴，服饰用丝绢剪裁贴上。

样板扇即向前来订货的买家展示各类扇骨样板，供其选择，反映了清代外销扇贸易的订购方式。



此类茶叶盒是欧洲女眷们在家中举办饮茶聚会的重要用具，清代广州行商和各国外商也常选此类茶叶盒作为馈赠礼品。盒面绘描金人物宴席图，人物后有一六扇屏风，上书苏轼《前赤壁赋》名句。盒身四面饰描金戏剧人物纹，为《三国演义》张飞挑灯夜战马超的故事，内置锡制茶叶盒。这种形制的茶叶盒在19世纪较为流行，与早期出现的茶叶盒内部构造有所不同。18世纪初因中国茶叶价格不菲，盒内配备茶叶罐体积较小，且采用一套两件或多件的组合形式，以满足根据宾客个人喜好对茶叶进行自由混搭饮用的需求。茶叶外盒可上锁，钥匙多由女主人保管。从不同时期茶叶盒的规格和配置差异，亦可看出饮茶风尚传播对中西贸易的直接影响。





清代
黑漆描金人物纹游戏盒

游戏套盒是 18、19 世纪中国外销漆器产品中最为流行的外销种类。这套游戏盒外层大盒内装 5 个长方形小盒，大小盒盖面中部位置均设一椭圆形开光图案，内绘定购者的姓名缩写字母“C. M.”。大盒盖面正中绘方形开光庭院人物纹，方形主题纹饰外另设四花形开光，内绘圆圈锦地纹，些许红彩点缀其中；其余地方绘金地卷草花卉纹，四边饰黑漆描金缠枝纹。盒身均绘红彩圆圈锦地纹和金地卷草花卉纹，其中一面卷草锦地纹饰尚未完成描金工序，可见草稿痕迹。



清代
黑漆描金徽章纹团扇

英国汉门德（Hamond）家族约1830年在广州定制。扇面绘有英国汉门德家族与格雷姆（Graeme）家族的四等分纹章，可判定定购者为两家族的后辈格雷厄姆·汉门德准男爵，四等分纹章中展现的正是其父安德鲁·汉门德与其母安妮·格雷姆的个人纹章信息。汉门德家族的两代人分别于1790年和1830年前后在广州定制纹章瓷餐具及漆器，留存至今实属不易。这对团扇制作精美、保存完好，且断代准确流传有序，是清代中西贸易交流极为罕见的实物例证。

清代
黑红漆描金人物纹披肩盒、盒架

由黑红漆描金披肩盒、内套纸盒和黑漆描金盒架三部分组成。盒盖面正中为红漆描金海棠形开光庭院人物纹，背底正中绘有人物花卉纹，并有椭圆形开光，买家购买后可根据自身需要绘画纹章或商标。盒身正面书“白本椭满花大巾”字样。内置纸盒彩绘庭院人物图，人物面孔采用象牙制作粘贴，服饰也用丝绢剪裁贴上，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花形开光外绘 16 个圆形小开光，绘牡丹、莲花、荔枝、佛手等岭南花果。盒架呈方形，四直脚，有牙角，十字枨上置海棠形模板，四角位饰黑漆描金缠枝纹饰。





外国造木嵌螺钿几何纹首饰盒

2世纪初

从 16 世纪开始，东亚地区的漆器制品以其光亮无瑕的特殊材质和精湛工艺激发了欧洲数百年的市场需求，中国工匠很快便顺应西方审美生产出专供外销的漆器及各类家具产品。嵌螺钿工艺是外销漆器和家具中常见的装饰工艺，主要用于装饰器物的表面，器物的外沿也常嵌以各种几何形螺钿边饰。受进口东方艺术品影响，欧洲本土工匠开始仿制生产同类型产品。18 世纪中叶以后，欧洲生产工艺发展迅速，小型的首饰盒、游戏盒、文具盒等生产数量众多。

此盒为木胎，外国工匠将贝壳磨制成菱形、三角形、长方形等薄片，与打磨后的彩石条、木条有序拼接、组合镶嵌于硬木表面，形成繁密工整的各类几何纹饰。整盒制作工序繁复，是中西文明交流互鉴和工艺融合的例证。

17世纪末，新航路带来海上贸易的繁荣，西方航海国家直接与中国通商，中国瓷器大量出现在欧洲市场，定制中国纹章瓷的风尚开始兴起。这是现存年代较早的一件在广州定制的纹章瓷餐盘，盘中心绘制的是英国乔蒙德利（Cholmondeley）家族与另一家族联姻的纹章。该盘采用釉下青花绘制的龙凤纹结合铁红描金缠枝花卉纹作为边饰，体现了18世纪30年代定制纹章瓷的典型边饰特征，尤其是青花龙凤纹边饰，目前仅发现不超过10套纹章瓷餐具采用，且均为1720年前后定制的产品，体现了中国外销纹章瓷作为清代私人贸易个性化定制产品，除展现卓越的瓷器烧制工艺外，也具有重要的断代参考价值。



该盘由法国德·古尔特邦纳侯爵（Marquis de Courtebonne）侯爵约 1745 年定制，整器绘工极为精细，盘沿采用的墨彩边饰出自维也纳杜·帕奇尔瓷厂的设计，这是一种以交织凸起带状纹饰、格子、卷叶等为主要元素组合而成的巴洛克式纹样。盘的中部还以“白加白”工艺绘制繁密的卷草花卉作为底纹装饰。

“白加白”（*bianco sopra bianco*）源自意大利语，利用不透明的白色料在白色或浅色釉面加绘图案，18 世纪初传入广州口岸即被广彩匠人熟练掌握。采用这种技法的产品工艺复杂、产量少但制作精良，是广彩制瓷与西方工艺结合、难得一见的精品。



清乾隆

墨彩圣经故事图茶叶罐



墨彩瓷最早出现于清康熙年间，至雍正、乾隆时墨彩技法成熟，期间西方来广州订制的宗教纹样瓷器多采用墨彩加描金绘制，使画面效果与西方版画更为契合，常见的主题有“耶稣诞生”“耶稣受难”“耶稣复活”等。该茶叶罐正反两面饰墨彩描金圣经故事耶稣复活图，耶稣在云雾中高举双臂，身体四周笼罩着光芒，地面看守坟墓的士兵正在熟睡，表现耶稣复活的情景。此罐绘制的稿本出自 18 世纪 50 年代荷兰艺术家简·勒伊肯 (Jan Luyken) 创作的有关基督出生、受难、复活和升天的系列版画作品。

广彩西洋人物采樱图盘

清乾隆

主纹饰西洋人物采樱图为西方顾客来样订烧图案，源自法国版画家尼古拉斯·庞塞 (Nicolas Pince) 1775 年根据皮埃尔·安东尼·波杜因的画作创作的版画，工匠为适应瓷器装饰效果，简化了景物，并吸收了欧洲油画技法。该题材先在荷兰流行，1740–1750 年广彩瓷即出现此题材不同版本的纹样，不仅展现了广州工匠善于学习、融汇中西的技艺，也记录了乾隆盛世中西文化交流的轨迹。



主纹饰为渔夫图（Le Pêcheur），源自荷兰版画家德·钟治（C. J. Visscher de Jonge）的版画，该版画又参考了荷兰著名画家亚伯拉罕·布隆梅特（Abraham Bloemaert）的素描。亚伯拉罕曾创作数百幅人物、风景、神话和宗教相关素描作品并集结出版，其中有不少作品被广泛临摹，这幅作品描绘了河边垂钓的闲暇田园场景，1735年至1755年间在中国外销瓷产品中大量出现。此类专门绘制欧洲绘画或人物主题的瓷器产品其定制成本要比普通产品贵出一倍，体现了中国外销瓷生产从18世纪初的纯粹中国风格向顺应西方审美需求、逐渐融入欧洲装饰主题和元素的明显转变。





广彩描金戏剧人物纹章纹椭圆形盘

清嘉庆

此盘主题纹饰为杨贵妃与高力士。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停止从中国购买大宗瓷器，英国本土对从中国进口的瓷器也征收高达100%的税率，为了保住订单，私人定制瓷器的品质得到明显提升。嘉庆年间的纹章瓷常将中国传统人物故事图与西方纹章结合，定购者的纹章或盏饰绘制在器沿上方，清代以前广为流传的文学名著、戏剧故事和文化名人，如三国演义、西厢记、杨贵妃等纷纷被绘制在瓷器上，随商船送达欧美市场。

广彩人物纹章纹汤窝

清道光

汤窝是18世纪中期随着西方饮食文化发展而出现的外销瓷新器型，兼具实用和装饰功能，是餐桌上最能吸引眼球的器皿之一，故其造型和做工较为考究。中国瓷匠快速适应不同市场的使用习惯和喜好，吸收欧洲装饰手法，烧制出椭圆形、长方形、圆球状、仿生动植物形等多种造型。这件汤窝是英国考尔菲尔德（Caulfeild）家族约1825年定制套装餐具中的一件，绘制精美、保存完好，连极易散失的托碟亦能保存至今实为难得。





清代
铜镀金珐琅瓶变字转花开花钟

报时之际瓶顶红花盛开，四角绿树转动，钟底出现“喜报长春”。广钟造型多为以祝寿、年节祝福等为主题的亭、台、楼、阁建筑或葫芦、盆、瓶等具吉祥寓意的器形，其最突出的特点是表面颜色鲜艳的黄、绿、蓝各色透明珐琅与细密繁缛的西洋花纹，以及大量配置的水法、转花、变花、跑人、转鸭、鸟音等新奇巧妙的变动机械装置，融中西技艺、文化于一体，体现了广州与西洋、地方与宫廷制钟技术与设计理念的交流与互动。



清代

银鎏金累丝烧蓝山水纹嵌玻璃内胆香水瓶

内有厚玻璃瓶，瓶带长方形钮玻璃塞。瓶周身旋圆纹银累丝，饰柳亭、松树、帆旗、塔等烧蓝纹饰。造型别致小巧，线条优美，融玻璃吹制与银鎏金累丝烧蓝工艺于一体，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代表了清代广州外销银器的较高水平。

清代

人物肖像象牙细密画

公元前 2000 年，细密画作为装饰开始出现在埃及的卷物上，古希腊、罗马也十分流行。15、16 世纪，以肖像画为主的细密画成为人们喜爱的艺术品，细密肖像画日益盛行，最初主要流行于法国宫廷。在小块象牙上绘制细密画，难度大成本高且费时，清代广州港出售的象牙细密画可减免关税，深受水手、商人们喜爱，这类肖像画成为他们在广州期间的纪念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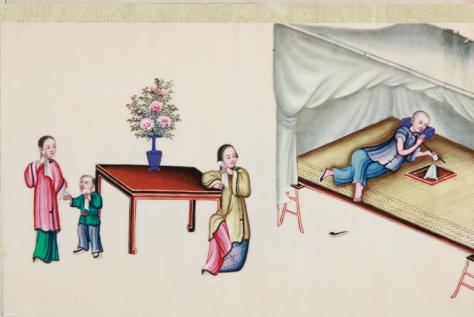


清代广州外销画种类和题材繁杂广泛，反映了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浓厚兴趣，其中展现中国代表性产品，如瓷器、茶叶、丝绸等的生产工艺流程的系列画作，成为西方人了解相关生产技术的主要来源，在西方市场备受青睐。水彩画和水粉画因画幅较小，售价较低、便于绘制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泛题材，在外销画市场中占有最大份额。这些系列主题的小型画作大多被合订成册或集装成盒，以 12 幅为一组（与西方常用计数“dozen”一打 12 件有关）出售。



这是来自广州永泰兴的作品。永泰兴是广州最出名的通草画室之一，创作了众多反映当时中国及中国人文化和习惯的通草画作品。这是其中一个系列：“The life of an Opium smoker from the time of his great opulence to the time of his utter misery”（鸦片是怎样让人一步步从富足健康彻底堕落为一个悲剧的），全册一共 12 幅，每幅均有英文注释，方便西方顾客了解画面故事。





两广总督的中国龙船油画

1882年

美国友人约翰·科尔·库尔(John Cole Cool)先生捐赠

广州口岸外销画家掌握西洋油画绘制技法后，创作生产大批产品畅销欧美。广州外销油画题材广泛，西方人对龙舟竞渡这项中国传统节庆活动尤为着迷，为投其所好，外销画常见此类题材。在这幅描绘中国龙船的油画中，广东画匠根据中国人的作画习惯将绘画的主题置于画面正中，画面除一艘龙舟外并无其它的场景和人物，显得静止而缺乏动感，似乎只是向外国客商展示龙舟题材本身而忽略了龙舟竞技的实况，这也恰恰体现了外销画常作为展示中国风物细节的直观载体，侧重于满足西方社会了解中国特定主题的独特功能。



石湾窑陈渭岩制青釉俞伯牙陶塑像

清末民初 广州市文物总店有限公司提供

石湾窑产品分为日用陶器、园林陶器、美术陶艺、手工陶器、丧葬陶器等，可掌上赏玩或置于案上观赏的“石湾公仔”是其最具特色的产品。清代中叶以后，其题材内容极为广泛，在人物的塑造上，不少作品达到了以形写神、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此像为石湾五大名家之一陈渭岩的作品。其人物陶塑作品，既体现了石湾陶塑的传统特色，又受外来文化因素影响，尤其是在人物形象的构造上，明显受到西洋人体解剖肌理技法影响，显得细腻传神，但作品本身始终保持了石湾陶塑艺术的古朴、纯真、沉稳的艺术韵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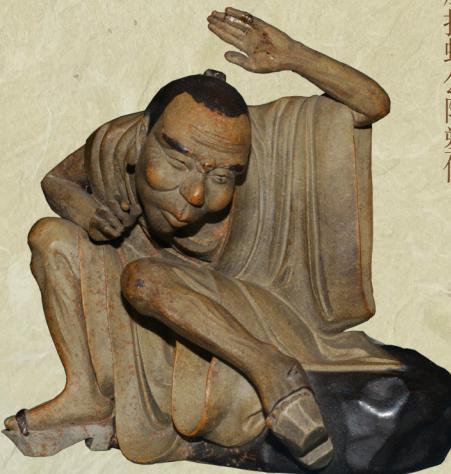


石湾窑刘佐潮制素胎拍蚊公陶塑像

近代 广州市文物总店有限公司提供

陶塑“拍蚊公”在石湾作品中较为常见，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此类作品面世，深受民众喜爱。这类作品以日常生活中的频繁琐事为题材，反映了大众本来的生活面貌与内涵，以极其朴素的手法和纯真的情感，展现了鲜明而深刻的意蕴之美，表达的石湾艺人们的审美情趣。

刘佐潮是与陈渭岩同期的陶艺名家，其作品也体现了石湾陶塑的地方特色，其人物形象、衣纹线条及施用色调均单纯流畅，充满生活艺术气息，体现了拙朴的艺术美感。



第四部分 赓续相传的红色文化

Revolutionary Culture: Passing on and on

百年淬炼，英雄城市。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拯救民族危亡，诸多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前赴后继，为探索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出路而奋起反抗，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广州成为民主革命策源地。1921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将暗夜里的中国引向光明。自此以后，岭南大地风雷激荡、星火燎原，从大革命中心到广州解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州以勇立潮头的气魄，书写了一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红色史诗。

Since the Opium War, China was confronted with the most acute crisis that involved a fight for its very survival. With immense perseverance, numerous courageous patriots fought for the nation's independence and the people's liberation. Guangzhou became the cradl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where tenacious struggles took place. The year 1921 witnessed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o take Marxism as its guiding ideology and brought lights to the Chinese people. Since then, a prairie revolution fire was started. From the Great Revolution to the liberation of the city, Guangzhou, led by the CPC, and with the persistence and determination of being the forerunners, surprised the nation by an epic revolutionary story of fighting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China.

清代

由林氏家族于咸丰年间辑录刊刻，全书共37卷，分十册，此为第五册。

林则徐在禁烟抗英的斗争实践中形成了师夷长技、积极抵御西方侵略的海防思想。收录于《林文忠公政书·使粤奏稿卷二》的《复奏查察虎门排鍊炮台摺》详细记录了他赴粤任职期间，亲自督导缴获走私鸦片、勘察虎门等处炮台，从而全面掌握海防形势、巩固海防体系等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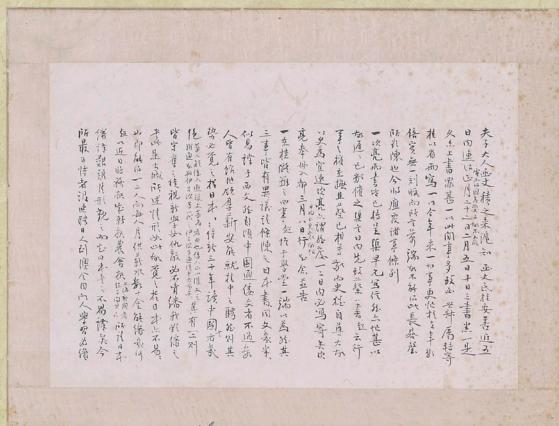
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

面对愈加严重的民族危机，1891年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宣传维新思想，培养变法人才。这是康有为著《长兴学记》，是其在广州长兴里讲学时制定的学规。



梁启超致康有为函
康有为之女康同薇女士捐赠

康有为与其学生梁启超组织学会，创办报纸，数次上书皇帝，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维新变法运动。这是1897年4月4日，梁启超致康有为信函。信函主要就康有为在桂林开办学堂、翻译日文书、办报馆、筑路等设想作出答复。梁启超赞同在桂林开设学堂，但对其他三项事宜均提出异议。他结合自身办报经验，认为桂林当地民风未开，加之经费不足，不适宜办报。由于缺乏专业人才等原因，不适宜在桂林翻译日文书籍、修筑马路。



(共8函，此为首函)

《民报》第八期

近代

早在康梁宣传维新变法之时，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在香港、澳门、广州等地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随后孙中山在其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朱执信（1885—1920），名大符，中国民主革命家，广州番禺人。朱执信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并有一定研究，他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和《资本论》有关内容，在《民报》刊发《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等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成为辛亥革命前国民党内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第一人。



孙中山积极倡导“航空救国”，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孙中山曾盛赞谭根所开办的飞行学校。谭根，广东开平人，生于美国旧金山，是飞行家和水上飞机设计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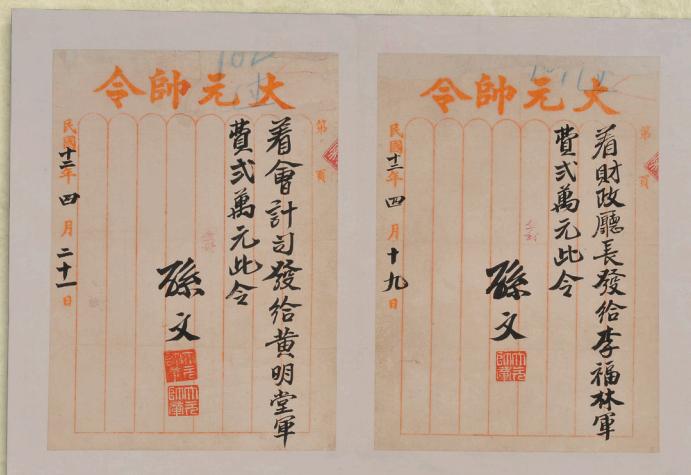
孙中山手书『志在冲天』横幅
近代

杨仙逸(1891—1923)，字学华，号铁庵，原籍广东香山县，美国夏威夷华侨，中国近代航空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革命空军之父”。



大元帅手令
1923年

辛亥革命失败后，为捍卫共和，孙中山先后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造就了广东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此为孙中山1923年4月签发的大元帅令，分别下令财政厅长和会计司发给李福林、黄明堂各两万元军费。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1924年1月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广东共产党、青年团组织积极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大力开展工农革命运动，迅速开创了国民革命的新局面。



《工人运动》

1927年7月

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广东的工人运动，党的三大会议对广州及港澳地区的工人运动作出专门部署。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共广州地委积极利用有利条件，派出大批干部大力开展工人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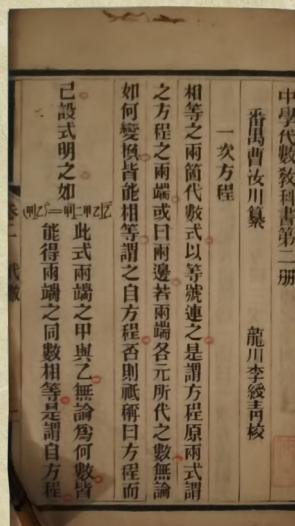
1926年8月31日

从1925年6月到1926年10月，持续了16个月之久的省港大罢工是世界工运史上历时最长的罢工。中国共产党在省港大罢工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邓中夏、苏兆征、周恩来、陈延年等参与其中。



近代

1924年8月，中共广州地委正式建立了以阮啸仙为书记的农民运动委员会，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广州的农民运动迅速复苏。



广东省农民协会会员临时会证

1925年

1925年5月1日，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广东省农民协会，制定农会章程，通过了农民自卫军与民团问题、农工联合以及加入赤色农民国际等七项决议案。



《少年先锋》（一卷10期）

192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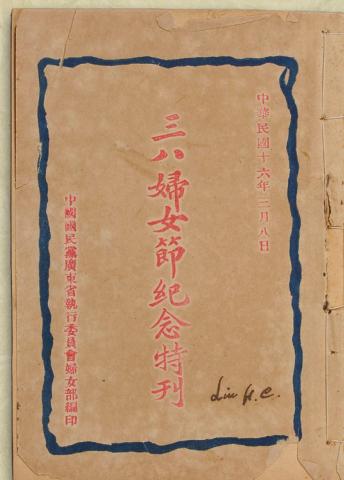
随着各项革命运动的高涨，广州的学生、妇女运动也深入开展。1922年5月，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召开，1925年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1月在广州出版的《少年先锋》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的机关刊物。



《三八妇女节纪念特刊》

192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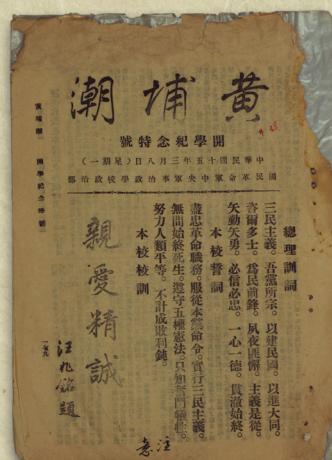
1924年3月8日，在广州召开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这是中国第一次举行“三八节”纪念活动，对唤起觉醒、争取妇女权益起到推动作用。5月，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广东妇女解放协会，为全省妇女运动的大发展打下了组织基础。



《黄埔潮》（开学纪念特号）

1926年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东郊的黄埔长洲岛创建陆军军官学校，中共广东区委积极参与了创办军校的各项工作，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以自己的政治远见和模范行为影响军校，对军校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广东党组织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救亡呼声》是在广东党组织的大力支持和促进下，于1937年建立的广东第一个公开合法的统一战线群众救亡团体——救亡呼声社的社刊。



近代

该报1937年8月在上海创刊，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办刊宗旨，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上海沦陷后，1938年1月在广州复刊，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州抗日救亡运动最重要的宣传阵地之一。



1949年10月1日

抗战胜利后，广东党组织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和平民主和准备革命战争的方针，一方面争取实现和平，另一方面为解放华南创造有利条件。1949年10月，在广东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人民解放军南下大军发起解放广东之役。



1949年

1949年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进入广州，除了海珠桥被炸毁和少数几个仓库被破坏之外，广州未遭受严重的破坏，广州城基本上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



1949年
广州解放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东亚大酒店职工业余同乐会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地下党员在东亚大酒店秘密组织成立的工会组织。广州解放当天，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带领下，工会工人连夜缝制五星红旗，并于 1949 年 10 月 15 日清晨将其从酒店三楼升起。



1949年10月21日，叶剑英、方方率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机关进驻广州市。1949年11月11日，广州举行隆重庆祝解放大游行和人民解放军入城式，广州民众载歌载舞，20多万人参加了此次游行，共同庆祝广州新生。

1949年
庆祝广州解放的游行队伍照片



1949年
广州解放时骑兵队走过检阅台的照片



1949年
朱光检阅工人纠察队照片



爱群大厦悬挂的毛主席画像照片

1949年2月2日

1949年11月11日庆祝广州解放大游行当天，在当时广州最高的建筑爱群大厦外墙悬挂出一幅毛主席巨幅画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幅毛主席巨像，宽10米高30米，约8层楼高，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领导下的香港进步美术团体“人间画会”成员关山月、廖冰兄等30多位画家集体创作。1949年11月初，巨幅画像从香港送达广州市军管会，由十多位工人合力挂上爱群大厦外墙，前来观画的市民挤满了马路。



结语

中国故事，广州篇章。

古今交融，老城焕新。

青山绿水，红色基因。

创新引领，共建湾区。

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如今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迎来新的挑战和机遇。我们每一个人，既是亲历者、传承者，也是开创者、践行者。让我们一起守护历史文化根脉与红色血脉，弘扬传承，守正创新，书写新的历史篇章。

Epilogue

Understanding China from Guangzhou, where new looks take place in the old city. Revolutionary legacy is passed on and on across the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Let us deepen the innovation-driven reforms and construct Greater Bay Area together.

On the new journey in the new era, we are acutely aware that the city still faces new challenges and chances. All of us are the exact participants who witness, experience, and create the city. Let us carry forward the red revolutionary gene and pass down the cultural root of the city with strong momentum of innovation and concrete efforts, and strive to create new glories!

展期

2022年9月27日—2023年2月5日

地 点

广州博物馆镇海楼展区专题展厅

Date

September 27, 2022 - February 5, 2023

Venue

Thematic Exhibition Hall, Guangzhou Museum

参观指引

1. 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
周二至周日 9:00-17:30（17:00 停止进馆）
 2. 地址：广州市越秀公园内镇海楼
 3. 咨询电话：020-83550627 / 83545253





廣州博物館
GUANGZHOU MUSEUM

文字编辑	余 曼	常丝茗	邓玉梅
文字校对	余 曼	邓玉梅	
排版设计	陈睿琳	吴宛霖	
英文翻译	邓玉梅		
审 定	曾玲玲	朱晓秋	